本版编辑：木　言
E-mail：z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124



# 怀念柯棣华和傅莱

编者按：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央党校离退休干部局在老干部中开展抗战纪念征文活动。部分老干部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历史故事，还原历史真相，缅怀英烈，开创未来。本报选登其中部分文章与读者分享。

□ 洛　林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国际友人，白求恩医院的柯棣华（印度人）和傅莱（奥地利人），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救命恩人。

1942年在晋察冀边区，我随着机关干部队伍，来到驻在唐县葛宫村的“白校”——白求恩医院。大家是来检查身体的。原来，根据地的医疗设备非常缺乏，白求恩医院里的柯棣华和傅莱两位大夫，研究出一个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办法：利用老百姓浇地的水渠，驱动一台小小的发电机，并在水渠上架个小木桥，桥上建了一间只够两个人使用的小黑屋，屋里装着一台小型X光透视机，就用它来给干部战士们进行肺部的透视检查。

大家都检查完了，医院的工作人员拿来一封写好的信，交给我，说：“请你把这封信交给你们单位的领导。”我拿着这封信，非常奇怪地想：“为什么别人检查了身体都没有写信？只有我给了封信，还要交领导？难道是因为我有肺病？”

这封信让我陷入了痛苦的回忆：我的四个哥哥全被肺结核先后夺去了生命，母亲也为此哭干了眼泪，但侵略者绝不会给一位伤心欲绝的“支那”母亲丝毫的同情。没想到，噩运也降到了我的头上。1939年在北平协和医院给我检查肺部时，我也被确诊为肺结核患者。当时，15岁的我被迫休学。但假如休学，就不能再搞地下工作。为此，经过我再三向组织上要求，领导上才批准我带着肺结核病来到抗日根据地，当时我还不太了解这个病的严重性，也从没有被这个病压倒过。

拿着这封信，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按捺不住那份疑问，最终还是把它拆开看了。唉呀！这一看可不得了，我痛哭起来。原来，信中写的是：这个孩子已经只能再活半年左右，她还年轻，而且，只有一个肺长了肺结核，另一个肺是好的，正符合我们做“人工气胸”试验的条件。希望见信后，送她来白求恩医院进行治疗。

一阵巨大的悲痛压迫着我，我情绪低落，恨这场战争，更恨日本人连看病的时间也不留给我。但是，组织上并没有放弃我，领导和同志们反复劝说我接受治疗。我想，暂且“当着活马医”吧，便同意去接受实验治疗。

白求恩医院虽然设在农家村庄，各方面的医疗设备十分简陋，但在当时，它却是晋察冀边区唯一的一流医院。另一位姓李的女同志和我同样来做试验。我们不但不懂什么叫“人工气胸疗法”，更不懂什么科学试验，思想上很紧张。傅莱大夫和柯棣华大夫十分重视，他们一面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治疗肺病的重要性，讲解什么叫“人工气胸疗法”，一面亲自带我们去看试验室，边参观边介绍。虽然其程序之复杂令人眼花缭乱，而且由于条件所限，用的是土方法，但了解后心里压力还是减了不少。

在20世纪40年代，除了大城市里个别外国医院刚刚有“青霉素”之外，中国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没有土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在当时的敌后根据地，更是缺医少药，许多患上肺结核的干部得不到及时治疗。所以，这两位国际友人创造出这种土法来进行试验，我和李同志被选为第一批的试验者。

傅莱大夫分工为我做手术治疗。他十分耐心地向我说明“人工气胸疗法”的好处，甚至在进行手术时，也不断地讲述：“这一针只有火柴一样粗细，扎入胸腔并不很痛。”很快地他就往我的胸腔里打气，我没有什么感觉，几分钟后，停气拔出针，他用消毒沙布盖上那小小的伤口，手术就完事了。

我和李同志先后结束手术被送回病房。回到简陋的病房后，意外地发现，我的床上竟挂上了一个蚊帐。这蚊帐在根据地里是十分罕见的东西，老百姓没有，广大的干部和军队首长也没有。成天行军打仗，哪有蚊帐可以挂上？住下不久，中国医生对我讲：“由于你们俩是做人工气胸疗法的，在胸部打入气以后，一个肺被压平了，停止了呼吸，翻身起床都有困难。两位国际大夫怕你们被蚊虫叮咬难受，便主动地把自己的蚊帐拿出来给你们用。并且，把自己每天喝的羊奶也拿来给你们喝。全是为了你们更快地恢复健康。在咱们目前的条件下，整个晋察冀边区恐怕只有这两位国际友人才有蚊帐和每天喝羊奶的待遇。你们可要珍惜啊！”



洛林，91岁，1924年生于北平，1933年入香山慈幼院读书，1939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1983年退休。著有回忆录《生命的春天》。

我一时哽咽了……

两位洋大夫每天来看我们一两次，十分关心我们能否睡得好，吃得好。记得傅莱大夫常来为我们检查肺的情况。为了让我安心养病，有一次他把听诊器交给我，叫我听听自己的肺。我仔细地听，果然，一个肺呼吸得很有劲，另一个肺完全听不到声音了。傅莱大夫十分耐心地告诉我：“有病的肺长时间休息，就好得快。”

因为享受这样超级的待遇又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的健康恢复得很快。据柯棣华大夫说，最少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休息，但刚刚休息一个多月，日本鬼子就来“扫荡”了。为了安全，医院把我送到一座很高的大山上去了，那里住着五六户老乡。据说，那是最安全的地方，鬼子一般“扫荡”到不了那地方。

我住在那山顶上，每天用自己的铁质小瓷碗熬小米粥喝，老百姓有扁豆角，把它放入小米粥里，再放点盐。每天吃这样的饭，对身体恢复很有益，病情一天天好起来。

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也听不到山下日本鬼子“扫荡”的情况，可按一般规律，鬼子“扫荡”不可能时间这么长。所以，我自己决定下山。我一个人背着自己的被子，告别老乡，边下山，边打听敌情，终于回到了自己工作的单位。从此我不再吐血了，但我记住了傅莱大夫的嘱咐：要多吃豆腐拌大蒜。我每到一村，就打听村中谁家卖豆腐。我总是买或用米饭向老百姓换一块豆腐，然后把大蒜和豆腐拌在一块，放点儿盐就吃下去。只要有条件就吃，这样吃了很久。

1943年的一天，傅莱大夫一行干部途经我们晋察冀第四分区的驻地，准备赴延安。他对我的病情十分关心，通过领导，找到了我。我接到通知马上去看他。见到青春满面、健康活泼的姑娘，他开玩笑地批评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病情告知我？”

的确，我是他们为了治疗根据地军民中传染性肺结核病的第一位科学试验对象，应当及时告知病情。可当时的环境十分困难，根本不可能办到。他也知道，我是无法找到他们的。他看我精神状态很好，但手头没有仪器，无法检查治疗的情况，只好告别。

抗日战争时期，医术高超的国际友人白求恩（1889—1939）、柯棣华（1920—1942）、傅莱三位大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我们晋察冀解放区。没想到机缘巧合，他们中竟有两位给我治过病。更没想到我和傅莱大夫的友谊会源远流长：从1943年分别，1946年在张家口的大街上碰面为我做X光检查，直到解放后在北京，往来家宴叙旧，甚至2002年傅莱大夫病重入院，也依然在关心我的离休生活和写作。

傅莱大夫2004年11月1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他的墓地，就在他战斗过的唐县军城镇的晋察冀烈士陵园，与白求恩、柯棣华大夫墓地比邻。墓地正门上书“傅莱之墓”，墓门两侧对联是“辗转万里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奉献一生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大门内墓地中部是傅莱大夫的半身汉白玉雕像，后面墓地六角形石座上安放了一个很大的刻有世界地图的石地球。

白求恩、柯棣华和傅莱，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亲历与感动
中央党校老干部
纪念抗战文章选登

# 在此给养　在此起航

□ 郭险峰

**心灵的飞翔。**非常难得的机会，使我这个党校的新兵成为全国党校系统教研与管理骨干理论研修班中的一员。在踏入中央党校的那一刻，曾经于我的所有角色都统一了，幸福地、完完全全地回归为一名学生，放飞心灵，于党性和知识的大课堂里自由翱翔。

优美的校园、洁净的教室、静谧的环境、满园的花香、规律的学习生活，让我终于可以静下来，聆听自己的内心，为纠缠的思维理出一点儿头绪，为困顿的心潮寻找新的出口。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中央党校的学习是为我们在工作‘热运行’中提供了一个‘冷思考’的宝贵机会，创造了一个能静下心来‘踱方步’的宝贵时机”。的确，短暂但单纯、规律的学生生活，让我突然感到身体不疲累了，心的躁动也熨平了。早晨可以从容地在校园里晨跑；午餐和晚餐后可以跟同学沿着校园的石径悠闲地散步，或闲谈或讨论或思考。一天一天看着池塘水榭的冰渐渐消融，看着河堤湖岸的柳枝慢慢抽出新芽，看着圆里路边的玉兰和桃花蓦然绽放枝头；看着云从头上流过，太阳慢慢地东升西落……于是曾经荒芜的心的草原也开始复苏，各种感觉和想法蹭蹭蹭地冒出，不经意间有了葱茏的绿意，不由自觉地进行内心的梳理和清扫，主动地学习和写作，变得从容而理性。

**全面的提升。**中央党校的课程安排得很紧凑很丰富：经典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性教育、党校教学与规范的管理，等等。除此之外，还外请重量级专家领导开设了关于大数据、国家外交政策和战略、环保问题、党的情侦保卫工作、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问题、生理健康、心理调适等方面的讲座，内容丰富多彩。

中央党校开设的这些课程，恰恰是我以往关注很少的领域，丰富和完善了我的知识体系。教授们在展现知识魅力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个也许是我以往不经意忽视的道理：要成其为一个好的教师，必然要涉猎范围广，视野眼界宽，在此基础上，还要熟练掌握多种高超的授课技巧和方法。两个月来，中央党校安排了各领域风格魅力各不相同的数十位教授为我们授课，或沉稳大方，或幽默风趣，或深刻睿智，或新颖别致。教授们在授课方法上也各有千秋，或是娓娓道来，循循善诱；或是妙语连珠，滔滔不绝；或是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或是图文并茂，内容翔实；或是留有余地，启人深思。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活，让我营养了知识，储备了力量。

**信念更笃定。**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性就是根本。加强党性修养是领导干部改造主观世界的永恒课题，是提升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重要举措。

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程中，对党性的锤炼和提高在各个方面各种时刻静静地开展着：在中央党校校训“实事求是”中，在“党校姓党”的施教办学原则中，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中，在专家教授们高屋建瓴、深刻透彻的理论梳理中，在专题讨论中，在形势与任务报告中，在现场教学中，在参观中央党校校史中，在校纪校规的遵守中，甚至在电影鉴赏中。共产党员党性的光辉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我们，提醒我们要加强党性锻炼，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信仰，成为“对党忠诚、个人干净、勇于担当”的共产党员。

**视野更开阔。**此次研修班，汇集了全国各省市、各区县党校的教研、管理骨干们。来自不同地方的学员，政治阅历、知识构成、个人经历和经验等都有所不同，构成了一个能够相互交流的学习共同体。而中央党校浓厚的学习氛围，又构筑了一个可以相互学习的良好环境。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坦诚地交流各自学校的教学、科研情况，热烈而深入地探讨老师们的授课内容、当前现实热点问题、某些理论困惑等。更会彼此相助，真诚关心。通过交流，我不仅仅拓展了眼界，更在知识见解、理论理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学到了很多。同学们看问题的方法、工作的方法、为人的态度和处事原则，深深地熏陶着我。同学间的情谊，也将是我人生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成为我今后工作和生活的动力。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教师、全国党校系统教研与管理骨干理论研修班学员）

我在中央党校的
学习和感悟征文选登

# 凭吊云南滇西腾冲国殇墓园英烈

□ 李德忠

来凤山下扫倭狼，
叠水河流吟悲壮。
伫立似嗅血腥气，
视听犹临恶战场。
一寸山河一腔血，
杜鹃泣泪哀国殇。
忠烈祠前慰英灵，
勿忘国耻当自强。

（作者单位：辽宁省本溪市委党校）

# 日本投降前夕 毛泽东的布局

□ 倪德刚

毛泽东1945年6月在给王震南下部队电报中，估计日本失败尚有一年半。1945年8月4日，毛泽东在给李先念的电报中，预计日本投降尚需一年。6天后，即1945年8月10日晚，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得知日本已准备投降。毛泽东从何渠道获此消息，《毛泽东年谱》没有解释，《毛泽东传》也没有记载，毛泽东此后也从未提及信息来源一事。信息来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式投降前五天，毛泽东做出了五大战略布局，这五大布局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做出由兵力分散向兵力集中的战略布局。**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以游击战为主，兵力分散。抗战期间兵力分散，不易被日军大规模吃掉，有利于机动灵活消灭日伪军，有利于牵制大量日军，更有利于武装和发动群众。既然得知日本投降，不把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就没有力量大规模消灭日伪军。

为此，8月11日，毛泽东指出：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

毛泽东这一战略调整和布局，为迅速缴械日伪军做了充分准备，为扩大解放区和保卫解放区做了充分准备，为制止内战和不得已而反击内战做了充分准备。

**做出由制止内战向坚决反击内战的战略布局。**蒋介石骨子里想打内战，消灭共产党。毛泽东想方设法制止内战，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谈判就是制止内战的实际行动。制止内战的最好办法，就是坚决回击内战。毛泽东在得知日本投降的当天，就指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第二天又强调：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为此，毛泽东在8月11日指示：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各解放区应有必要兵力防御国民党进攻，国民党一旦向我大举进攻，我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放手武装群众，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放手发动减租，组织群众，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群众中的基础。

8月13日，毛泽东提出制止和反击内战的三原则。第一，蒋介石左右手拿刀，我们也左右手拿刀；蒋介石磨刀，我们也磨刀；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第三，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

**做出由分散占领向重点占领的战略布局。**抗战胜利前，蒋介石躲进了“峨眉山”，国民党的主要势力自然也随之集中在西南地区，实力雄厚。中国大部分地区为日伪占领。毛泽东得知日本投降后，认为动用我党的全部武装力量全面夺取日伪占领区，不现实，也不可能。切实可行也最为紧要的是重点占领中小城市，广大乡村，交通要道，扩大解放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关于占领中小城市，8月10日，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电报中指出：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

关于占领广大乡村，8月12日，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电报中指出：江南力量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

关于占领交通要道和扩大解放区，8月11日，毛泽东说：占领一切可能的交通要道。8月12日，毛泽东又强调：江北力量的任务是占领津浦路，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关于创建新的根据地，8月11日，毛泽东在给王震部队电报中，指出：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反击内战。

毛泽东重点占领的布局。其一，为迅速消灭日伪军做了准备。其二，迅速扩大了我党的武装力量。其三，迅速做好了反击内战的准备。

**做出由拒绝原地待命向迅速缴械日伪武装的战略布局。**8月10日深夜，朱德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附近敌伪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不缴枪者坚决消灭。

然而，蒋介石却下令说：朱德发表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并命令八路军总部：“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对于蒋介石的逆行，毛泽东予以坚决反击。8月13日，他连续撰写《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在舆论上彻底揭露了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发动内战的阴谋。舆论上反击蒋介石的毒计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用实际行动迅速反击。

8月11日，中央连续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等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

8月15日，以朱德总司令名义直接给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下了七道命令：诸如，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我军命令；所有被我军包围的日军，保存一切武器、材料，静候我军受降；所有在我防区的飞机、舰艇，应即停留原地；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等。

毛泽东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三篇文稿及十三道命令。由于采取迅速反击蒋介石的阴谋和就地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政策和行动。使我们党既及时制止了内战，又为彻底最后消灭日寇做了充分准备。

**做出由配合苏军作战向东北直接进军的战略布局。**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作战。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对苏联对日宣战，表示热烈欢迎。8月12日，毛泽东指示我华北各部队务速分兵北进。

东北，地理位置、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等都极为重要。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以来，毛泽东高度重视东北。中央两次专门研究和部署东北的工作。

关于东北抗联。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在听取关于东北抗联的报告后，他指出：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出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

东北工作刻不容缓，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1944年9月4日，中央专门开会研究东北工作，毛泽东指出：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指示晋察冀分局及冀中区委、冀热区党委，山东分局及胶东区党委各成立一满洲工作委员会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为此，毛泽东在指示我军配合苏军作战的同时，迅速决定派部队直接进军东北。8月12日，毛泽东命令冀东三个军分区部队分别向承德、赤峰、沈阳进军。同日，指示山东分局，万毅东北军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毛泽东及时做出直接进军东北的战略布局是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一招。

这五天，毛泽东是怎样工作的呢？《毛泽东传》记载：抗战最后胜利，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是毛泽东没想到的。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物，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这就是毛泽东五天做出五大战略布局的工作情景。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研部）

文史天地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　照排：中央党校报刊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